

探尋大國外交的連續性

● 程亞文

《世紀之旅》的作者堅持以傳統的民族國家和國際政治的視角來解釋人類的政治選擇。他們把注意力聚焦於二十世紀那些對國際政治產生了主導性作用的大國的政治選擇上。他們通過分析英、法、德、俄、美、日、中等大國在二十世紀的所為，找出主宰她們外交行為的穩定性因素。



羅伯特·A·帕斯特編：《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下稱《世紀之旅》）一書所探討的是世界政治的連續性問題。在該書的作者們看來，二十世紀大國外交的風雲變幻，儘管具體的內容和形式在不斷翻新，但「萬變不離其宗」，總有一些基本的東西很難改

變，而正是這些東西，在更大程度上主宰了主權國家的戰略選擇。

該書的作者們仍堅持以傳統的民族國家和國際政治的視角來解釋人類的政治選擇。據他們考察，在二十世紀，決定國際政治的主要是大國之間的關係。有鑒於此，他們又把注意力聚焦於二十世紀那些對國際政治產生了主導性作用的大國的政治選擇上。他們的意圖是明確的，那就是通過分析英、法、德、俄、美、日、中等大國在二十世紀的所為，找出主宰她們外交行為的穩定性因素，這些相對穩定、曾在長時期內發揮作用的因素，據他們的看法，仍將對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產生關鍵性影響。

二十世紀七大國的外交行為真的具有強大的連貫性嗎？該書作者為我們很好地勾畫出了這樣的線索。比如，對英國來說，在二十世紀前夕，她的宏大戰略包含兩大目標：一是保證通向大英帝國最遙遠角落的航道暢通無阻；另一是防止任何一國主宰歐洲大陸，她們都是在近幾百年間形成的。在二十世紀，這兩大目標同樣深刻地左右了英國政治家的外交選擇。當然，誠如該章作者利伯 (Robert J. Lieber) 指

出，英國人對既往傳統的這種固執，在二戰之後實際上也成為實力已明顯下降的英國的一個包袱。又比如，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 在分析二十世紀的法國外交時，非常精當地概括說：「十九世紀臨近結束時，活躍在世界舞台上的法國有兩大憂患。一百年後，這兩大憂患依然未消」，法國人憂患甚麼呢？其一是德國的力量及其走向；其二是擔心自己走向衰落。這兩大憂患讓二十世紀的法國領導人大傷腦筋，而二十一世紀的法國人，恐怕一時還是無法走出這兩大憂患的陰影。再比如，在喬菲 (Josef Joffe) 筆下，德國人在這一點上始終沒有大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德國的一切戰略構想都曾想把東西方關係德國化，因為德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無法像英國和美國那樣置身事外」。作者為此詳細論證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從阿登納 (Konrad Adenauer) 到勃蘭特 (Willy Brandt)、從追求统一到致力於緩和的外交政策形變中的神未變，勃蘭特的選擇儘管看起來與阿登納背道而馳，但這只不過表明，在不同時期因為形勢變化，捍衛「道」的方式有所改變而已，但聯邦德國要扮演起東西方關係仲裁人的政策，卻貫穿了兩個不同時代的不同外交作為。

其他的幾個大國莫不也是如此。美國人在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的理想主義與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的現實主義的相互糾纏中渡過了二十世紀，不過，它在二十世紀的一個發明：建立跨國性秩序，卻已成為它的一個習慣性外交思維。俄羅斯人的「俄羅

斯特殊論」，在三個俄羅斯——沙皇帝國、蘇聯和蘇聯解體後的新俄羅斯之間一脈相承。日本人在近現代以來，卻選擇了「一味追求強權的機會主義」，「強權第一的想法使日本外交政策非常現實，這種現實主義成了整個現代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大特點」。最後，中國人呢？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說，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二十世紀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如出一轍，貫穿了相同的目標：強調統一和穩定，渴望獨立，強調強大與安全，要繁榮昌盛，建立平等的社會，要求尊嚴、得到尊重、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等等。

儘管本文作者並不覺得書中的所有敘述都能經得起推敲，但還是深以帕斯特等人的研究思路為是。幾年前，本文作者也曾深深着迷於在大國的戰略選擇中發掘「不易發生變化的因素」，認為任何一個具有自身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在她的過去與現在之間，都會存在有密切關聯。概括地說，這種關聯性就是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傳統及在傳統作用下的特定戰略思考方式，戰略文化傳統或說戰略思維一旦形成，就將保持強大的慣性，若無國家生存情勢的根本性改變，一般情況下都將持久穩定地存在，並對一個國家的具體表面的戰略抉擇，起到了「看不見的手」的背後支配作用。現在再對照該書作者的分析來看待當時所想，其實，一個國家在外交和戰略決策中的連續性，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正在於戰略文化傳統體現了法國史家布羅代爾 (Fernand

奧克森伯格說，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二十世紀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如出一轍：強調統一和穩定，渴望獨立，強調強大與安全，要繁榮昌盛，建立平等的社會，要求尊嚴、得到尊重、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等。戰略文化傳統或說戰略思維一旦形成，就對一個國家的具體表面的戰略抉擇，起到了「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作用。

《世紀之旅》探討的雖然是大國外交的連續性，但卻提醒人們思考兩個問題：其一，一個國家應該如何服從歷史的安排，從對自身戰略文化傳統的了解中汲取政治智慧，從而提高外交和戰略決策的科學性？其二，一個國家又應當如何掙脫歷史的安排，在變化了的情勢下適時更新戰略文化，以利於合理作出新的外交和戰略籌劃？

Braudel) 所講的「歷史結構」的穩定性，歷史中的「長時間」和「短時程」保持有可以察覺的因果姻緣。或者按已故旅美史家黃仁宇的話說，一切「小歷史」都能夠從「大歷史」中找到前因後果，「放寬歷史的眼界」，一切歷史發展就都沒有了甚麼令人感到突兀的事物。

《世紀之旅》一書的作者們同樣不僅僅滿足於指出大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而對大國外交行為中產生一以貫之事物的背後力量，表示了極大興趣並給予了一些解答。帕斯特 (Robert A. Pastor) 在他的概括性文字中，把支配大國外交的「背後力量」歸結為四方面：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國民精神風貌，以及國家所處的國際體系。在以上四個因素中，前三者都「具有相當大的常性和連續性」，所以非常「有助於解釋一國外交政策的延續性」。

該書作者把注意力投向於探求大國外交的連續性，然而，我們又並不能把一國外交政策的常性特徵誇得太大或把它教條化。變化是有條件的，不變化也是有條件的，一個國家的外交和戰略選擇，雖然極大地受到上述所談三個常性因素的制約，但一國所處的國際體系、以及該書所沒有點出來的另一種影響大國外交的至關重要因素——一國的文化形態，卻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的；相反，它們都有很強的變動彈性，當這兩者發生巨大改動時，一國的戰略需求將相應發生變更，而它必然又會反映到一國的外交實踐中，在這時候，一個國家可能會改變自身的外交行為，也必須改變自身的外交行為，否則，將使外交和

戰略選擇不能反映實際的戰略需求。

在這方面，英國在二十世紀的例子尤具有典型價值。二戰結束以後，光榮了幾個世紀的大英帝國已經消失，英國實力已不能與往時同日而語，根本無法再發揮昔日帝國的作用和影響力。然而，政治強人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仍稟承着英國傳統的大國思維，把英國看作是和美國與蘇聯一樣的大國，而且是代表重要的英聯邦利益的首領。戰略思維相對戰略需求的這種滯後，竟然使邱吉爾大發奇想，提出了「三環」理論。這位二戰時代的英國英雄傲慢地認為，英國應該對統一的歐洲扮演一個贊助者或祝福者的角色，而不是正式的一員，即使成為正式一員，英國也應該處於中心地位。邱吉爾曾經說過：英國「位於歐洲，但不屬於歐洲」。在英國人不合時宜的世界大國心態作用下，英國遲遲不能調整外交決策，它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1956年在和法國相聯合、自以為是地發動了為奪回蘇伊士運河而對埃及的戰爭後，美國、蘇聯乃至全世界都譴責她的行為，最終，在政治和財政的雙重壓力下，英國迫於自身困境只好從蘇伊士撤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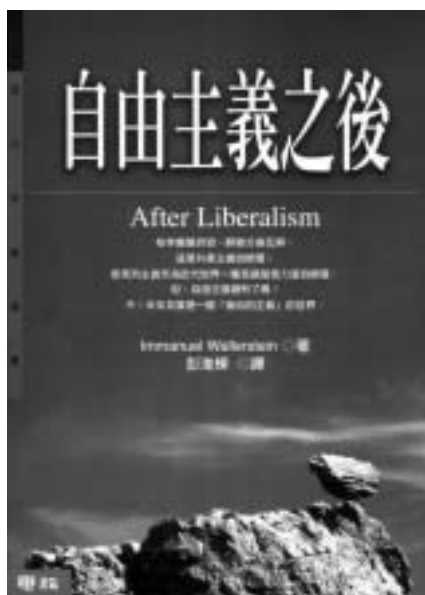
歷史意志是無情的，在強大的歷史意志面前，順應才是應該作出的選擇。讀完全書，本文作者認為，該書所探討的雖然是大國外交的連續性，但卻提醒人們思考兩個問題：其一，一個國家應該如何服從於歷史的安排，從對自身戰略文化傳統的了解中汲取政治智慧，從而提高外交和戰略決策的科學性？

其二，一個國家又應當如何掙脫歷史的安排，在變化了的情勢下適時更新戰略文化，以利於合理作出新的外交和戰略籌劃？本文作者覺得，這兩點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來說特別具有現實性：當今中國不僅要關心戰略文化的連續性，也要關心其變革性。從近百年的時間來看，中國人的外交行為和戰略思維實際上是處於不斷變化中，這一點與《世紀之旅》的作者們的判斷有所區別。對於當代中國來說，與一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是，中國已由一個傳統上與世隔絕、獨來獨往的「天朝大國」，演變成為世界經濟政治生態系統中的一個成員，對於一個相互糾纏的世界，中國不可能再像一百

年前一樣來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是，傳統資源對於今天並非全無意義，流行了上千年的「天下主義」和「文化主義」思想傳統，對於在當代世界建立國家與國家間的交往理性，仍然有着強大的參考價值。因此，當代中國人在與外部交往時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如何吸收傳統戰略文化資源來為現實的戰略抉擇服務，使中國人的戰略追求不遠遠偏離歷史規定的軌道；另一方面，如何認識與把握近百多年來在外部環境、文化形態和自身實力上的改變，從而主動積極地推動戰略文化的變革，以塑造出一個新型的地區性大國和有着世界影響的普通國家。

評《自由主義之後》

● 孫善豪



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著，彭淮棟譯：《自由主義之後》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1)。

「全球化」之所以會成為各種社會科學間一個共同使用的自我描述，其實很大一部分是由於這個概念本身的模糊：「全球化」究竟何指，迄今尚無定論，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所定論。唯其模糊，所以好用。

二十世紀90年代以降，隨着蘇聯東歐垮台和冷戰結束，我們這個世界似乎已經把自己——透過許許多多社會科學家——描述成了一個